

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分部： 東方善本研究所的發展沿革

波波娃 * 著 陳相因、呂正山 ** 譯

一、從「亞洲博物館」時期到「蘇聯科學院 東方學研究所」時期

十七世紀末，在俄羅斯與東方各國外交關係領域工作的人員，有必要瞭解東方各國的語言及其風俗，而成立了一個資料庫以備這些人員所需。這一資料庫於是開始蒐集以東方各國語言所寫成關於祭祀和風俗等主題的書籍。其來源是由俄羅斯的外交官及商人自東方購買書籍回國，還有來自東方國家的使節也進獻書籍給沙皇。到了十八世紀初，為了滿足政府及相關學者的需求及興趣，而有了成立一座專門蒐羅東方語言書籍圖書館的要求。

從一七一四年起，第一個由政府出資、專門蒐集手寫和古代印刷（包括木版印刷法及石印法）書籍的機關成立，也就是彼得大帝藏珍館（Кунсткамера）。正如一百年後科學院院士多爾恩（акад. Дорн）寫道，東方善本蒐藏專業化是與「彼得大帝成立科學院後，在其王權下傾注一國之力於東方研究上，開始收集中國、蒙古、西藏的著作，甚至是回教手稿」等種種措施相關。十八世紀時期，沙皇宮廷不只一次下旨命外交官、商人及俄羅斯駐外代表購買東方語言書籍。在一七二四年，當藏珍

感謝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善本研究所所長波波娃教授在 2007 年 12 月第一譯者訪問期間，提供該所的資料與各項研究訊息。本文原文翻自俄文，主要資訊亦可見於該所俄文網頁：<http://www.orientalstudies.ru/rus/>。

* 波波娃 (И. Ф. Попова)，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善本研究所所長。

** 陳相因，本所助研究員。呂正山，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學系碩士生。

館與科學院圖書館合併時，那些以東方語言寫成的書籍便成為科學院圖書館館藏的一部分。

一八一八年十一月，在科學院架構下成立的亞洲博物館是今日東方研究所的濫觴。科學院決定向駐在現今黎巴嫩阿拉波 (Aleppo) 與黎波里 (Tripoli) 兩城的法國領事盧梭 (J. L. Rousseau，也就是著名哲學家 Jean-Jacques Rousseau 的一位親戚) 購買一筆七百餘冊的回教手稿。這個計畫分一八一九年與一八二五年兩階段執行，當時花了五萬一千法郎的代價。當時主持這項採購案的科學院院長烏瓦洛夫伯爵 (граф Сергей Уваров)，在此之前一直計劃推動尚未執行的「東方研究院計畫」。一八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另有一說為二十七日)，在採購案前夕向科學院決策委員會提交關於建請科學院成立東方研究單位的書函，寫道：「皇家科學院博物館至今已存放了相當多的東方書籍與手稿，而此刻尚在等候從馬賽運來一批盧梭所收藏的回教手稿，屆時館藏將大幅度地增加。職是之故，余特向人民精神教育部大臣呈請，在科學院藏珍館的架構下設立專門保存紀念章、手寫文物及書籍單位的必要性。」在藏珍館中設立一處專門修繕與保存東方的手稿及書籍的單位。新的科學機構即命名為「亞洲博物館」，開放給任何對東方研究有興趣的居民，不需任何手續。

一年後，即一八一九年九月，首任亞洲博物館館長弗廉 (X. Д. Френ) 院士在《聖彼得堡公報》(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 上發表了亞洲博物館一週年工作報告。

一八四九年以法語書寫的亞洲博物館刊物《亞洲隨筆》(*Mélanges Asiatiques*) 問世。亞洲博物館在當時成為全世界唯一保存與研究東方善本的政府中心，並保證這些文物得到妥善的照顧，將之作為學術與實務的目的。亞洲博物館名列喀山大學之後，成為俄羅斯第二個東方研究中心。隨後在一八五五年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學系成立。亞洲博物館是服務本國與外國科學的專業化研究機構。善本的讀者並不僅限於聖彼得堡本地的漢學家，還有來自俄羅斯其他省分，甚至來自國外。亞洲博物館達成了俄羅斯一直以來身為東西方交流橋樑的使命。繼一八七三和一八七四年第一與第二次「國際東方學研究者會議」分別於巴黎及倫敦舉行之後，第三次會議則由聖彼得堡亞洲博物館擔綱主辦。

依據科學院管理委員會決議，一八六一年起亞洲博物館從原本位於大學河岸街三號的藏珍館遷出，搬到大學河岸街五號的一樓角間，窗戶面向海關的街角

(Таможенный переулоч) 及交易所公園 (Биржевой сад)。後來科學院圖書館搬遷至新大樓之後，亞洲博物館亦遷移到位於提弗利斯街一號 (Тифлисская ул.) 的獨棟建築裏。亞洲博物館不停擴充館藏，直至一九一七年時它已成為世界上專門收藏東方善本和古代印刷書的最大規模收藏地之一，是在涅瓦河畔的東方人民文化的真正寶藏。

十月革命後，一九二〇年代期間在全體委員會裏根據機關檢驗的報告中顯示，自一九二九年八月起，「亞洲博物館現在實際上是，未來也將是科學院在執行東方學領域裏唯一的研究中心」。蘇聯外交部以及國家共產國際在東方各國的工作經驗顯示了東方學在學術以及教學上的必要性，東方各國語言的文法和字典編撰的基礎研究都是必須的，同樣在一九二九年通過的〈東方學學目標宣言〉裏強調「全面地且深入地研究東方國家」的必要性。順應這樣的理念，成立了專門從事學術研究的東方學研究所，該所研究人員具有絕對的學術能力可處理當今亞洲博物館豐富的文獻資料庫藏。同年進行的院士遴選中，東方研究專家如漢學家阿理克 (В. М. Алексеев)、蒙古學家弗拉基米爾佐夫 (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高加索學家歐爾貝理 (И. А. Орбели)、東方古代歷史學家司特露維 (В. В. Струве) 等人雀屏中選。而自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三日起，蘇聯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在科學院組成社會學科分部，委員中包含東方學家群組，此群組的職權範圍又同時包括新成立的東方學研究所，領導人為歐里堅布爾格院士 (акад. С. Ф. Ольденбург)。亞洲博物館進入東方學研究所編制中，擁有獨立的預算及人員配置。

東方學研究所坐落於科學院圖書館大樓，在這裏提供蘇維埃東方的加盟共和國以及蒙古共和國大量的學術與教學協助，並為東方所有語言以拉丁字母化為基礎創造新的書面文字，這一系列也包括漢語。研究所對保存的善本文獻進行清點、造冊與編目，並開始編纂新字典的巨大工程。這工程的一部分僅在二次大戰後隨著中俄大辭典（1980 年代初）、日俄辭典（1970 年）、四冊的蒙俄辭典（2000 年）及其他等等書籍的出版，方才大功告成。

東方學研究所在史達林時期整肅運動及二次大戰的列寧格勒保衛戰中失去了不少成員。一九四三年時，研究人員必須撤離至莫斯科，而成立東方學研究所莫斯科群組。

二次大戰後世局轉變，使蘇聯當局加強對東方學研究政策的支持。一九五〇年六月一日，科學院主席團決議，「為了加強學術研究，並強化科學院主席團對東方

學研究所的全面領導，陳請蘇聯當局准許將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從列寧格勒遷至莫斯科」。研究所的東方善本文獻及其他重要館藏則續留列寧格勒。在一九四九年稍早的決議中，已決定將東方學研究所從科學研究院圖書館大樓遷至位於冬宮河岸街十八號 (Дворцовая наб. 18) 的新米亥伊羅夫斯基宮殿 (Ново-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Дворец)。

二、從「蘇聯科學院列寧格勒分部東方學研究所」到「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分部東方學研究所」

一九五一年東方學研究所遷移到莫斯科之後，所屬的東方善本部門依舊留在列寧格勒。該年夏天負責考察該部門現況的特別委員會總結指出：「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的手稿善本收藏是蘇聯民族的瑰寶，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東方手稿文物收藏地之一，當中部分的館藏文物更是舉世無雙。」

一九五六年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部的東方善本部門進行調整，納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位在科學院社會科學分部機構轄下，由歐爾貝理院士主掌。一九五六年開始，從原名「蘇聯科學院聖彼得堡分部東方學研究所」更名為「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分部東方學研究所」，歷經了種種成長與蛻變，長久以來在研究人員的共同努力之下，終於完成了清點東方國家古代手稿及印刷文獻及編製目錄的浩大工程。

這個時期並有眾多學術出版品的問世，包括館藏文物目錄及文物相關的學術著述、東方語言文獻之翻譯和研究成果，以及為數眾多的專題著作等。依據蘇聯科學院自一九七〇年十月二十九日起生效的決議，凱德夏院士 (акад. М. В. Келдыша) 及培維院士 (акад. Я. И. Пейве) 聯名簽署，界定莫斯科及列寧格勒分部學術工作的分野。列寧格勒分部主要領域為「東方各民族書面語的學術編目與出版，並研究階級社會產生的問題，以及在東方資本主義體制出現之前的發展與變遷的特性，及其歷史、東方民族所使用的書面語，還有東方各國文化發展的規律性與東方各國社會思想史」。

今日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部的基本學術重點為，東方的古代與中古歷史、語言學、宗教、哲學、法律（有別於莫斯科東方學研究所側重在當代亞洲民族與國家，以及當代北非和太平洋地區）。聖彼得堡分部還致力於東方語言之手稿本及古

代印刷書的研究，並總論館藏書面文獻的學術應用。從列寧格勒到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的分支東方善本研究所，一直履行著這個城市與東方各國維繫的最重要的代表功能。

（一）重要學術成就

近年來聖彼得堡分部在近一百位同仁的努力下，每年平均出版三十至四十本學術專題著作，以及二百五十到三百篇論文。已故的涅夫斯基 (Н. А. Невский) 在一九六二年曾獲得列寧獎章（前蘇聯時期學術界最高榮譽），丹達馬耶夫 (М. А. Дандамаев) 和包里夏卡夫 (О. Г. Большаков) 分別在一九八七年和二〇〇一年獲得國家勳章。聖彼得堡分部大部分的同仁皆為博士或副博士，一位為通訊研究員（也就是上述的丹達馬耶夫）。有許多研究所的同仁同時也是外國科學院或學術團體的成員。

改名為聖彼得堡分部以前的時期，主要學術成果與聖彼得堡學派息息相關，創立了獨一無二的東方學研究方向，茲列如下：緬施科夫 (Л. Н. Меньшиков) 和邱古耶夫斯基 (Л. И. Чугуевский) 的敦煌學研究；涅夫斯基 (Н. А. Невский)、科恰諾夫 (Е. И. Кычанов) 與柯平格 (К. Б. Кепинг) 的唐古特民族研究；倫京 (А. Г. Лундин) 的薩巴研究；柯黎胥托爾尼 (С. Г. Кляшторный) 的突厥盧恩文研究；庫爾得耶夫 (К. К. Курдоев) 的庫爾德學。針對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從屬的亞洲博物館收藏目錄的研究與理解，有精通不同語文的語言學家來擔任此工作，像是阿基穆胥金 (О. Ф. Акимущкин) 精通波斯文，哈里朵夫 (А. Б. Халидов) 的阿拉伯文、德米特利耶娃 (Л. В. Дмитриева) 的突厥文、沙瑟金 (А. Г. Сазыкии) 的蒙古文、彼得洛娃 (О. П. Петрова) 的韓文、格列格勒德 (В. Н. Горегляд) 的日文，及其他東方語言等。此外，還編纂了最大、最完整的漢俄及蒙俄辭典。還有基礎研究的進行，如司特露維 (В. В. Струве)、幾亞科諾夫 (И. М. Дьяконов) 和丹達馬耶夫對上古時期東方的研究；阿理克的漢學；康拉德 (Н. И. Конрад) 的古日本研究；倪基欽娜 (М. И. Никитина)、特洛契維奇 (А. Ф. Троцевич)、耶利塞耶夫 (Д. Д. Елисеев) 的古韓國研究；里夫胥茲 (В. А. Лившиц) 的索格迪亞那人書面文字研究。在翻譯東方經典方面，寇津 (С. А. Козин) 翻譯了《蒙古秘史》(Сокровенное сказание [тайная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ов])，卡瓦列夫斯基 (А. И. Ковалевский) 完成了《訊息（又可譯為伊本法德蘭的旅程）》(Путешествие Ибн-Фадлана)，司密爾諾娃 (О. И. Смирнова) 翻譯了

拉希德·丁 (Рашид ад-дина) 的《編年史彙編》(Сборник летописей)。最後，圖瑪諾維奇 (Н. Н. Туманович) 編輯出版了過去著名俄羅斯學者巴爾托里德 (В. В. Бартольд) 的著作。

(二) 近年學術成就

出版三冊裝的學術專書《哈里發的歷史》(История Халифата)，該書作者包里夏卡夫 (О. Г. Большаков) 因此獲得二〇〇一年俄羅斯聯邦勳章。普洛佐洛夫 (С. М. Прозоров) 編著四冊的參考書《沙俄時期境內的伊斯蘭教》(Ислам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бывш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付梓。近年將為數可觀的西藏語手稿與木刻書籍館藏目錄電子化。阿拉伯基督教善本目錄的籌備工作已然就緒。克洛里 (Ю. Л. Кроль) 翻譯了中國古代重要的政論書籍《鹽鐵論》(Спор о соли и железе)。

(三) 手稿善本蒐集

在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部藏有超過十萬部珍貴的手稿善本及古代印刷書籍，東方研究學者檔案室中保存所有俄羅斯珍貴的東方研究文獻。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部的東方手寫文獻館藏是俄國最大，同時也是世界最大、最重要的收藏地之一。所藏包括六十五種仍在使用的及已亡佚之語言的文物，居世界之冠，包括：阿比西尼亞文（埃塞俄比亞文）、阿拉伯文、亞美尼亞文、喬治亞文、歐洲語文、印度文、庫爾德文、波斯文、塔吉克文、梵文、所格狄亞那文、撒克遜文、吐火羅（大月氏）文、突厥文、維吾爾文在內的手稿文物；及中文、韓文、滿文、蒙古文、唐古特文、藏文、日文善本和木版文物。此外，出版了印度、伊朗和其他古代俄羅斯東方國家印刷書籍。

除了手稿文物的收藏之外，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部亦設有東方研究相關的藏書室，藏有超過八十萬冊書籍。其中最具有價值的，是三十年代所藏入，以前蘇聯民族語言所寫成的書籍。